

中国共同富裕的时空演进、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冯苑 聂长飞

内容提要:本文在科学阐释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中国2013—2019年26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并进一步从不同区域划分视角分析时空演进、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特征。研究表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稳步上升,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共同富裕发生等级跃迁的概率较大,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集聚特征;各省份共同富裕区域差异有所降低,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东中西和南北区域划分情形下共同富裕差异的主要来源;除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外,全国及其他地区具有 σ 收敛特征,而全国及各地区均存在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定量研究,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共同富裕 评价指标体系 时空演进 区域差异 收敛性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2)12-0065-20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的征程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成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心课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标的时间线——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等多次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如何科学界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准确测度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共同富裕在全国、区域、省域层面,以及时间、空间维度的变化特征又是怎样的?回答以上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系统监测、理解和把握中国共同富裕的真实发展状况,而且能够为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收稿日期:2022-09-16;修回日期:2022-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南北差距的测度、成因与对策研究”(22CJL007)

作者简介:冯苑 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讲师,南昌,330022;

聂长飞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南昌,330031。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斗目标提供政策依据和决策参考。

关于共同富裕的现有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内容涵盖了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基本特征、战略目标、制约因素、实现路径等主题,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共同富裕的定量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共同富裕的定量测度,主要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分别进行综述。从国际视野看,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减贫、收入分配等与共同富裕较为相关的议题历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相继提出普惠式增长、亲贫增长、包容性增长等概念,并通过亲贫增长指数、包容性增长指数等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共享程度进行定量刻画^[1-3]。纳拉扬等(Narayan et al.,2013)^[4]、拉克纳等(Lakner et al.,2014)^[5]进一步提出了共享繁荣指数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全社会最贫穷的40%人口的收入或消费增长率。在此框架下,费雷拉等(Ferreira et al.,2018)测度比较了2008—2013年83个国家的共享繁荣水平^[6]。卡夸尼等(Kakwani et al.,2022)借助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中国的共享繁荣状况进行衡量,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公平,进而促进共享繁荣^[7]。

国内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对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刘培林等(2021)紧扣“共同”和“富裕”的核心要义,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8]。杨宜勇和王明姬(2021)从富裕共享性、富裕差异性两个方面刻画“共同”,从物质富裕、生活富足和环境宜居三个方面表征“富裕”,提出了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9]。蒋永穆和豆小磊(2022)基于对共同富裕核心内容和目标要求的理解,提出了人民性、共享性、发展性和安全性四位一体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10]。胡鞍钢和周绍杰(2022)构建了包含生产力、发展机会、收入分配、发展保障和人民福利五个维度20个基础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11]。与此同时,少数研究对共同富裕的定量评价进行了探索性尝试。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借鉴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路和方法,测度分析了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富裕状况^[12]。李金昌和余卫(2022)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浙江省2015—2020年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进行了定量监测^[13]。孙学涛等(2022)从富裕水平、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三个维度选取13个指标,对中国2003—2019年281个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评价^[14]。向云等(2022)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选取34个指标,测算了中国2011—2019年31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指数^[15]。韩亮亮等(2022)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测度了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16]。胡联等(2022)从农村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和公共服务差异四个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界定,并从全国和省域层面对中国共同富裕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价^[17]。

尽管上述文献基于不同的方法与视角展开研究,但仍然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就国外文献而言,虽然共享繁荣指数等概念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考虑了收入不平等和机会均等等问题,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共同富裕的核心含义,且相关测度框架和研究方法对科学评价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用于对中国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直接测度。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共同富裕所强调的富裕和共同均包含多个层次含义,具有多维性,不仅包含收入水平的增长和均等化水平的提升,还应包含教育、医疗、文化、养老、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均等程度;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构建和量化指标选取必须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而上述指标并未考虑这一点。就国内文献

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在评价指标选取时,更多侧重共同富裕的富裕维度,而对共同维度的刻画相对不足。例如,韩亮亮等(2022)^[16]、胡联等(2022)^[17]构建的省级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中缺乏区域发展差距的指标,而提升区域发展均衡度是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孙学涛等(2022)采用城市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反映区域差距^[14],但这种衡量方式值得商榷,因为这类指标实质上体现的仍是富裕程度。二是国内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对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考察,即探究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等如何影响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共同富裕水平,而非共同富裕本身,因而缺乏关于共同富裕的时空演进、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等深入分析,不利于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中国共同富裕的真实状况。

有鉴于此,本文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科学可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采用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从全国、区域、省域三个层面以及时间、空间双重维度对中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演进特征、区域差异、收敛性等进行全面分析。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深入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紧紧围绕“富裕”和“共同”两大关键词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拓展定量研究;第二,全面、系统考察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进特征,相关测度结果和研究结论能够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第三,在分析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等问题时,不仅基于传统的东中西区域划分视角进行考察,还进一步从南北区域划分视角进行研究,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中国南北差距问题的相关文献。

二、中国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

(一) 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

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里叶、欧文、魏特林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共同富裕的构想。然而,这些构想仅仅停留在理论假想与局部试验层面,没能从根本上找到实现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使共同富裕理论第一次由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8],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19]、“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0]。同时,他们还强调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其中第一阶段采取按劳分配原则,追求的是贫富差距较小的差别富裕;高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按需分配,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追求,最终实现的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21]。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富裕理论。列宁和斯大林更加具体地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实现共同富裕。列宁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里,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将归全体劳动者享用而不是归一小撮富人享用”^[22]。斯大林指出,“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和文明的生活”^[23]。同时,他们还特别强调要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23-2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全面深入地创新和发展的共同富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贯穿在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中,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与智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不断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因此,这一时期共同富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代表的土地政策上,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有效激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索。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指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5]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通过“一化三改造”等措施“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26]。在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理论。邓小平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进而提出“先富后富—共富”的设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共同富裕思想存在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28]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此为指导实施的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政策,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有力保障。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思考和创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根本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其中,共享理念的基本内涵与共同富裕思想高度契合,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这为全面、科学、准确理解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新的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了新阶段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清晰战略目标,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形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共同富裕幸福图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共同富裕的内涵

共同富裕的概念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31],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科学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关键在于准确理解两个关键词:富裕和共同^[12-13,32]。其中,富裕强调的是发展问题,指的是社会财富的多少,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共同强调的则是公平问题,指的是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在新发展阶段,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富裕和共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1. 富裕的内涵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富裕水平的主要衡量标准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即关注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量”的方面。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开始转变,单纯依靠经济增长量的积累已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因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富裕应主要理解为经济发展“质”的规定,这正是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33]的缘由所在。总的来说,在新的历史阶段,富裕应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内容:一是经济发展优质,这是从宏观层面对富裕的刻画,因为只有保持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才能保证在面临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和短期冲击时维持经济增长的强韧性,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二是人民生活美好,这是从微观层面对富裕的反映,这里的生活美好绝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包括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不断增强;三是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度既是宏观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又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保障。需要说明的是,富裕虽然主要强调经济发展“质”的方面,但并非完全否定经济数量增长的意义。事实上,在保证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应有之义。

2. 共同的内涵

共同,在主体范围上,指的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时间次序上,强调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次序是非同步、有差异的渐进过程,与“同时”“同步”等概念存在实质性区别;在最终状态上,共同富裕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的是一种有差别的、合理的共同,反对绝对相同无差别和绝对平均主义,与同等富裕存在本质差别。在新发展阶段,促进中国共同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打赢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三大攻坚战”。在群体差距方面,虽然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但中等收入群体在人口中的比重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城乡差距方面,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6,虽然较2019年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外,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城乡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34]。区域差距方面,除了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之外,2013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经济总量“南升北降”、经济增速“南快北慢”、人均收入“南多北少”的新情况新问题^[35]。不仅如此,中国的南北差距还体现在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民生发展等诸多领域^[36],严重制约着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是在“做大、做好蛋糕”基础上“切好、分好蛋糕”。共同富裕既是共同的富裕,又是富裕的共同,是富裕和共同二者的有机结合,是公平与效率、发展与共享的内在统一。其中,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共同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归宿和核心目标。

三、研究设计

(一) 中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 指标的选取

本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以及各地方政府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践,紧扣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从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选取代表性指标,尽可能全面、准确刻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和主

要特征。

富裕水平方面,主要按照“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要求,从“质”的方面刻画富裕的基本内涵。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公共服务三个层面对富裕程度进行测度。其中,经济发展优质是前提基础,人民生活美好是核心目标,公共服务完善是关键保障。经济发展层面,选取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3个基础指标,因为经济效率是体现经济发展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37]。人民生活层面,从人民群众切实关心的收入、消费、住房和健康问题出发,选取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住房负担和健康状况4个基础指标进行表征。公共服务层面,选取教育供给、医疗供给、文化供给、养老供给、数字基础设施供给5个基础指标进行衡量,以全方位反映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求。

共同水平方面,主要聚焦中国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三大攻坚战”,从收入分配、城乡差距和区域协调三个层面对富裕程度进行刻画。收入分配层面,分别选取收入基尼系数和劳动者报酬占国内或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刻画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和初次分配公平程度^[38]。城乡差距层面,本文主要借鉴叶璐和王济民(2021)^[34]提出的城乡多维差距分析框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差距5个基础指标对中国城乡差距的状况进行综合反映。区域协调方面,对应城乡差距考察的关键领域,本文选取区域收入差距、区域教育差距、区域医疗差距、区域社会保障差距和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差距5个基础指标对中国区域差距的状况进行综合衡量。

同现有评价指标体系相比,本文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多维视角更加准确地刻画了“富裕”和“共同”两大关键词,不仅涵盖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维度,还包含了教育、医疗、文化、养老、数字基础设施等的供给水平和发展平衡性,更加符合中国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求。

具体地,本文构建了由2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衡量方式	预期影响方向
富裕水平	经济发展	劳动生产率	GDP/就业人员数(元/人)	+
		资本产出率	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索洛余值法测度	+
	人民生活	收入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
		消费结构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人)	+
		住房负担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健康状况	人均预期寿命/岁	+
	公共服务	教育供给	每万人普通中小学学校数(所/万人)	+
		医疗供给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千人)	+
		文化供给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个数(个/万人)	+
	养老供给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数字基础设施供给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户/人)	+	

表 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衡量方式	预期影响方向
共同水平	收入分配	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收入基尼系数	-
		初次分配公平程度	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	+
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	-
		城乡医疗差距	城乡居民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之比	-
		城乡社会保障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之比	-
		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之比	-
		区域协调	区域收入差距	省份内地级市人均 GDP 变异系数
区域协调	区域协调	区域教育差距	省份内地级市每万人普通中小学学校数变异系数	-
		区域医疗差距	省份内地级市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变异系数	-
		区域社会保障差距	省份内地级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变异系数	-
		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差距	省份内地级市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变异系数	-

2. 样本、数据与指标说明

本文以 2013—2019 年 26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以 2013 年为研究起点,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逐步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发展^[39],更加契合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西藏由于数据缺失较为严重,被排除在研究样本之外。同时,本文还剔除了四个直辖市样本,主要是因为:第一,直辖市与其他省份在行政等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区域协调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之一,现有文献往往采用区域内辖区某一指标的差异程度来反映,而在实践中,省份内地级市和直辖市市辖区的统计数据分别收录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由于市辖区部分指标统计不全等原因,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存在偏误。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PS 数据库。对于少数缺失的指标数据,主要通过查阅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官方资料进行补充,极个别无法获得的数据采用增长率法或插值法予以补齐。

部分指标衡量方法进一步说明如下: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索洛余值法进行计算^[39];各省份人均预期寿命数据借鉴张友国等(2020)^[40]的研究估计获得;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根据田卫民(2012)^[41]的做法进行测算。此外,对于指标体系中涉及的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名义变量,统一采用相应的平减指数换算成 2013 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变量,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在后续研究中,本文将分别按照东中西和南北两种区域划分方式对中国共同富裕的特征进行分析。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8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0 个省份。南北方地区以秦岭—淮河作为分界线进行划分,南方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 13 个省份,北方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3 个省份。

(二) 中国共同富裕指数的评价方法

1. 指标权重的确定

相较于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能够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故本文主要采用客观赋权法确定基础指标的权重。同时,在诸多客观赋权法中,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更加适用于动态、跨期比较分析,因而本文主要运用该方法进行赋权。基本赋权原理为:

设 $s = \{s_1, s_2, \dots, s_n\}$ 为被评价对象集, $w = (w_1, w_2, \dots, w_m)^T$ 为指标权重系数向量, $x_{ij}(t_k)$ 表示 i 省份第 j 个指标在第 t_k 年的原始值, $x_{ij}^*(t_k)$ 为经过极值处理法后的无量纲化值。对于时刻 t_k , 取综合评价函数 $y_i(t_k) = \sum_{j=1}^m w_j x_{ij}(t_k)$ 。

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可用 $y_i(t_k)$ 的总离差平方和来表示,即:

$$\sigma^2 = \sum_{k=1}^N \sum_{i=1}^n [y_i(t_k) - \bar{y}]^2 \quad (1)$$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bar{y} = \frac{1}{N} \sum_{k=1}^N \left[\frac{1}{n} \sum_{i=1}^n \sum_{j=1}^m w_j x_{ij}^*(t_k) \right] = 0 \quad (2)$$

进一步简化,得:

$$\sigma^2 = \sum_{k=1}^N \sum_{i=1}^n [y_i(t_k) - \bar{y}]^2 = \sum_{k=1}^N (w^T H_k w) = w^T \sum_{k=1}^N H_k w = w^T H w \quad (3)$$

可以证明,若限定 $w^T w = 1$, 当取 w 为矩阵 H 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时, σ^2 取最大值。同时,为保证所有指标权重为正,可进一步限定 $w > 0$ 。因此,指标权重系数向量可通过求解以下规划问题确定:

$$\begin{aligned} & \max w^T H w \\ & \text{s. t. } \|w\| = 1 \text{ 且 } w > 0 \end{aligned} \quad (4)$$

2. 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借鉴现有文献普遍做法,采用面板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基本公式为:

$$s_{ij}(t_k) = \begin{cases} 10 \times \frac{x_{ij}(t_k) - \min(x_j)}{\max(x_j) - \min(x_j)}, & x_j \text{ 为正向指标} \\ 10 \times \frac{\max(x_j) - x_{ij}(t_k)}{\max(x_j) - \min(x_j)}, & x_j \text{ 为逆向指标} \end{cases} \quad (5)$$

其中, $s_{ij}(t_k)$ 表示 i 省份第 j 个指标在第 t_k 年标准化的值, $\max(x_j)$ 和 $\min(x_j)$ 分别表示所有省份第 j 个指标在样本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此测度的共同富裕指数取值范围为 $0 \sim 10$ 。

3. 共同富裕指数的合成

运用线性加权法可以测度历年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及其分维度指数,共同富裕指数 Q 的合成公式为:

$$Q_u(t_k) = \sum_{j=1}^m w_j s_{ij}(t_k) \quad (6)$$

(三) 时空演进分析方法与区域差异测度方法

为全面考察中国共同富裕的时空演进趋势,本文借鉴聂长飞和简新华(2020)^[39]的研究,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中国共同富裕指数的总体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马尔可夫(Markov)转移概率矩阵测度中国共

同富裕指数的演进趋势,最后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和莫兰散点图方法对中国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相关性特征进行分析。同时,达古姆(Dagum)基尼系数法不仅能刻画评价对象的总体区域差异,还能揭示区域差异的来源,因而在区域差异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借鉴吕承超等(2021)^[35]的研究,主要采用该方法对中国共同富裕指数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

(四) 收敛模型

1. σ 收敛模型

σ 收敛模型主要通过观测评价对象对数标准差的时序变化趋势,来判定是否存在 σ 收敛。基本公式为:

$$\sigma_t = \sqrt{\frac{1}{n} \sum_{i=1}^n \left(\ln Q_{it} - \frac{1}{n} \sum_{i=1}^n \ln Q_{it} \right)^2} \quad (7)$$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ln Q$ 为共同富裕指数的自然对数, σ_t 为共同富裕指数第 t 年的 σ 收敛系数。若满足 $\sigma_{t+1} < \sigma_t$,则表示 σ 收敛系数是逐年递减的,说明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存在 σ 收敛,反之则不存在 σ 收敛。

2. β 收敛模型

追求共同富裕是全国所有省份的共同目标,而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很可能在未来趋于某一稳定状态,因此 β 收敛模型适合用于考察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长期变化特征。按照稳态水平是否相同, β 收敛可分为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两类,对应的估计模型如下:

$$\ln Q_{i,t+1} - \ln Q_{it} = \alpha + \beta \ln Q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8)$$

$$\ln Q_{i,t+1} - \ln Q_{it} = \alpha + \beta \ln Q_{it} + \delta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9)$$

其中,式(8)和式(9)分别为绝对 β 收敛模型和条件 β 收敛模型。 $\ln Q_{i,t+1} - \ln Q_{it}$ 表示省份 i 的共同富裕指数在第 t 年的增长率。在条件 β 收敛模型中,本文还加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共同富裕的控制变量 X ,包括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政府支持,用政府财政支出与 GDP 之比衡量;外商投资,用外商直接投资与 GDP 之比反映;对外开放,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计算;金融发展,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业务总额与 GDP 之比表示;研发投入强度,用研发经费支出与 GDP 之比衡量。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μ_i 和年份固定效应 η_t ,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β 表示收敛系数,若 $\beta < 0$ 且在统计上显著,则表明中国共同富裕存在 β 收敛。在此情形下,收敛速度可进一步表示为 $v = -\ln(1 - |\beta|/T)$,半程收敛周期可近似表示为 $\ln 2/v$,其中 v 表示收敛速度, T 表示样本考察期的年份数量。

四、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 全国层面

2013—2019 年全国共同富裕指数的变化趋势^①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同富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均值从 2013 年的 4.76 提高到 2019 年的 5.84,年均增长 3.45%。从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来看,2013 年中国富裕指数为 1.01,2019 年提升至 1.61,年均增长率高达 8.13%,略高于同

^① 全国共同富裕指数以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均值表示,后文不同地区共同富裕指数采用地区内省份均值衡量,不再另作说明。

期中国 GDP 增速,这一结果也与杨耀武和张平(2021)^[42] 计算的中国 2013—2018 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年均增长 8.63% 较为接近,说明新时代党和政府逐渐将经济发展重心由数量转向质量,由“做大”蛋糕转向“做好”蛋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与此同时,中国共同指数由 2013 年的 3.75 提高到 2019 年的 4.22,年均增长率仅为 1.98%,说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虽然有所好转,但改善速度相对较慢,需要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更加关注群体、城乡和区域等的发展差距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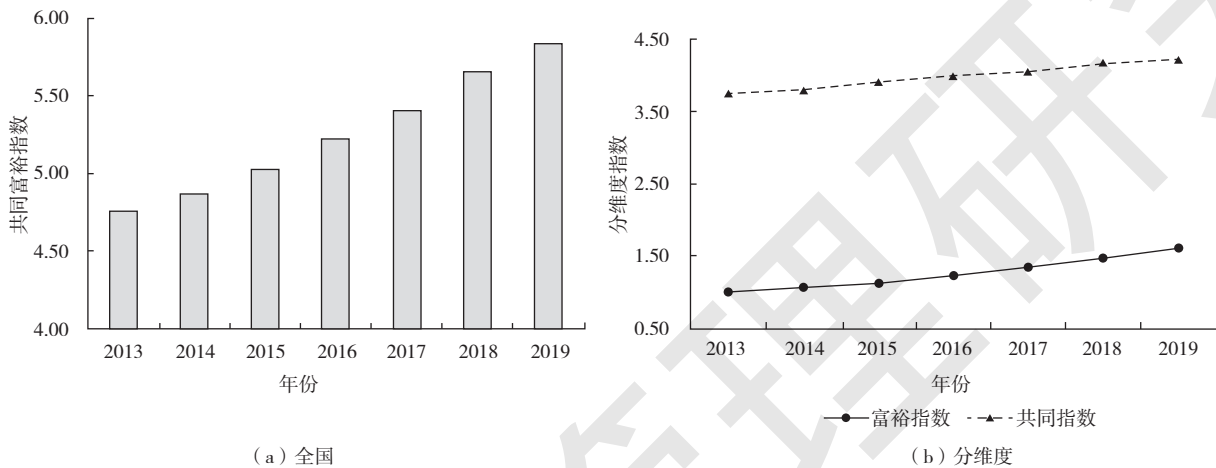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19 年全国共同富裕指数的变化趋势

(二) 区域层面

图 2 刻画了中国共同富裕区域层面的变化特征。从东中西区域划分来看,考察期内所有地区共同富裕指数均稳步提升,且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而言,在本文的研究区间内,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均值为 5.73,高于中部地区的 5.25 和西部地区的 4.87。从增长速度来看,样本期内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由 5.35 提高到 6.21,年均增长 2.53%;中部地区由 4.72 上升到 5.85,年均增长 3.61%;西部地区由 4.32 增加至 5.52,年均增长 4.17%。可见,虽然中部和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低,但其提升速度较东部地区更快,且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在共同富裕发展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存在“追赶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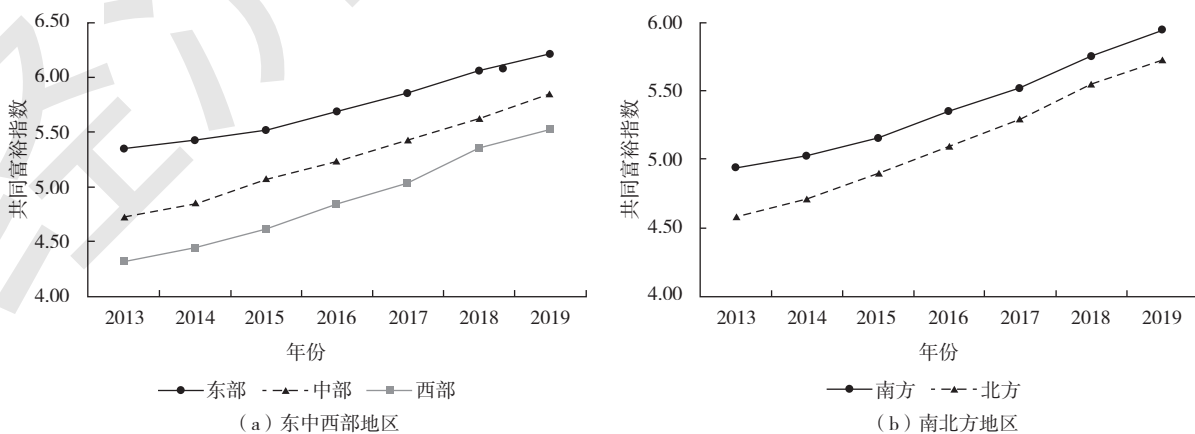


图 2 2013—2019 年中国分区域共同富裕指数的变化趋势

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均表现出稳定的上升态势,且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来说,样本期内南方地区共同富裕平均水平为 5.38,略高于北方地区的 5.12。从增速来看,2013—2019 年,南方地区共同富裕指数均值由 4.94 提升至 5.94,年均增长率为 3.12%;北方地区由 4.58 提升至 5.73,年均增长率为 3.79%,南北方共同富裕水平绝对差距有所减小。

(三) 省域层面

图 3 描绘了 2019 年中国 26 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指数及其排名情况。可以看出,2019 年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为 4.96~6.84,均值(M)为 5.84,标准差(SD)为 0.43。其中,有 14 个省份共同富裕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共同富裕指数得分为 6.84,在所有省份中排名第一,为中国打造浙江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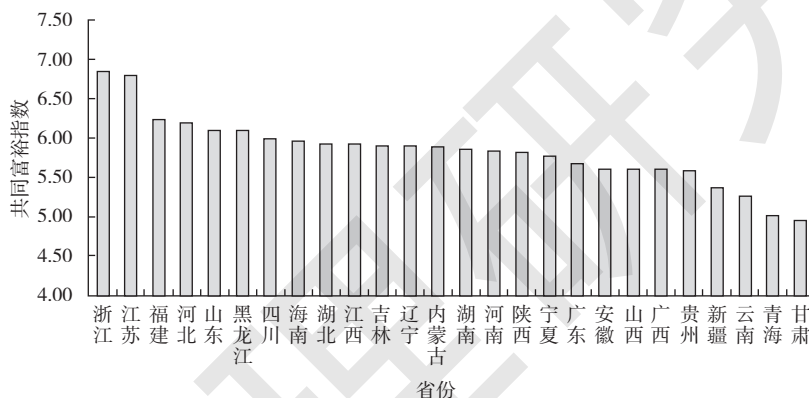


图 3 2019 年中国 26 个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及其排名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了定量的证据。从增速来看,青海(9.28%)、黑龙江(5.65%)、宁夏(5.63%)、贵州(5.14%)、甘肃(5.00%)的共同富裕指数年均增长率均达到了 5% 以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从省域差异来看,2019 年共同富裕指数得分最高的浙江是得分最低的甘肃的 1.38 倍,说明各省份共同富裕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

进一步,本文从共同富裕两个维度来考察不同省份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按照共同和富裕两个分维度指数排名之差的大小,可以将不同省份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共同型省份,即共同指数排名相对靠前、排名之差为负的省份;二是同步型省份,即共同指数和富裕指数排名一致、排名之差为 0 的省份;三是富裕型省份,即富裕指数排名相对靠前、排名之差为正的省份。

表 2 报告了 2019 年中国各省份富裕指数和共同指数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三种类型的省份分别为 11 个、3 个和 12 个。其中,河北、安徽、江西、广西、河南、黑龙江、海南、四川、山东、吉林和福建属于共同型省份,这些省份共同维度的发展状况优于富裕维度;山西、贵州和云南属于同步型省份,这些省份共同和富裕维度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辽宁、广东和青海属于富裕型省份,这些省份共同维度的发展状况劣于富裕维度。此外,从排名之差的绝对值大小来看,山东、吉林、福建、山西、贵州、云南、江苏、浙江、湖北和湖南 10 个省份排名之差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3,说明这些省份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的发展总体较为均衡。相反,其他 16 个省份排名之差的绝对值均大于 3,甚至远大于 3,在未来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仅要注重保持优势维度的进一步提升,更要关注短板维度的弥补、强化和追赶。例如,广东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2019 年富裕指数排名第 4,但由于其省份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以及城乡间发展的差距较大,共同指数排名位列倒数第 4,最终导致其共同富裕指数排名相对较低。对于这类省份而言,在今后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将短板维度的提升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表2 2019年中国26个省份共同富裕分维度指数排名

省份	富裕排名	共同排名	排名之差	类型	省份	富裕排名	共同排名	排名之差	类型
河北	24	1	-23	共同型	湖北	13	14	1	富裕型
山西	18	18	0	同步型	湖南	12	15	3	富裕型
内蒙古	5	20	15	富裕型	广东	4	23	19	富裕型
辽宁	3	22	19	富裕型	广西	25	10	-15	共同型
吉林	14	13	-1	共同型	海南	17	12	-5	共同型
黑龙江	16	4	-12	共同型	四川	15	11	-4	共同型
江苏	2	3	1	富裕型	贵州	19	19	0	同步型
浙江	1	2	1	富裕型	云南	21	21	0	同步型
安徽	26	8	-18	共同型	陕西	9	17	8	富裕型
福建	7	6	-1	共同型	甘肃	20	25	5	富裕型
江西	22	5	-17	共同型	青海	6	26	20	富裕型
山东	10	7	-3	共同型	宁夏	11	16	5	富裕型
河南	23	9	-14	共同型	新疆	8	24	16	富裕型

(四)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由于测度方法选择导致的实证结果偏误,本文通过改变指标权重、改变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的方法和改变共同富裕指数的合成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测度结果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至少达到了0.891,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测度方法的选择不会对共同富裕指数测度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证明了本文测度结果的稳健性^①。

五、时空演进特征与区域差异分析

(一) 基于核密度估计的动态演进分析

图4展示了中国共同富裕指数的核密度估计结果。就全国层面而言,共同富裕曲线表现出明显的右移趋势,说明全国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主峰高度提高且宽度收窄,说明各省份共同富裕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步缩小;波峰数量由双峰变为单峰,说明各省份共同富裕两极分化特征开始弱化。

从东中西区域划分来看,核密度曲线均呈现出右移趋势,说明不同地区共同富裕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主峰形态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主峰高度均先升高、后降低,主峰宽度均先收窄、后拓宽,说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西部地区主峰高度不断提升,主峰宽度不断收窄,说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有所降低。分布延展性方面,东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这是因为海南相对于东部地区其他省份共同富裕水平相对偏低;中部地区始终存在一个波峰,未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极化现象;西部地区波峰数量由双峰变为单峰,区域内部差异逐步缩小。

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核密度曲线不断右移,说明不同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主峰形态方面,南方地区主峰高度先上升后下降,主峰宽度先收窄后拓宽,说明南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北方地区主峰高度不断上升,主峰宽度不断收窄,说明北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正逐渐缩小。分布延展性方面,南方地区逐步由左右双拖尾转向右拖尾,说明区域内部共同富裕的极化程度有所缓解;北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左拖尾现象,这是由于甘肃、青海等省份共同富裕水平相对偏低导致的。

^① 限于篇幅,省略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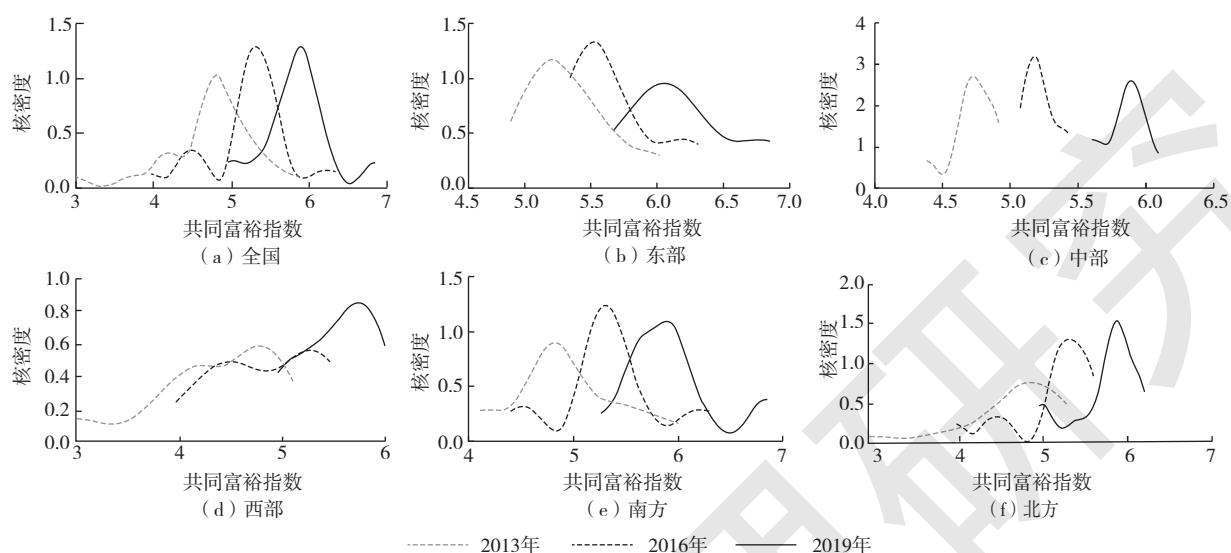


图4 全国及不同地区共同富裕指数的核密度估计结果

(二) 基于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的动态演进分析

根据共同富裕指数的绝对大小不同,本文采用四分位分类法(即 $k=4$)将共同富裕划分为I、II、III、IV四个等级,等级越高,表明共同富裕水平越高。在此基础上,表3 报告了中国共同富裕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的计算结果。其中,对角线上的数据表示共同富裕水平在 $t+1$ 年维持原有等级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数据表示共同富裕水平在 $t+1$ 年等级发生变化的概率。可以看出,在 $t+1$ 年各等级共同富裕指数继续保持原有等级的概率依次为 60.87%、47.62%、52.50% 和 100%,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各等级向上跃迁的概率较大,“等级I→等级II”“等级II→等级III”“等级III→等级IV”的概率分别是 36.96%、50.00% 和 42.50%;但跨等级跃迁较难,“等级I→等级III”的概率仅为 2.17%，“等级II→等级IV”的概率为 0。最后,共同富裕指数还存在等级向下转移的可能性,具体来说,“等级II→等级I”和“等级III→等级II”的概率分别是 2.38% 和 5.00%。

表3 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等级	I	II	III	IV
I	0.608 7	0.369 6	0.021 7	0
II	0.023 8	0.476 2	0.500 0	0
III	0	0.050 0	0.525 0	0.425 0
IV	0	0	0	1

(三) 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邻近权重矩阵和反距离权重矩阵测度了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莫兰指数,具体结果如表4 所示。可以看出,在两类权重矩阵下,所有年份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正向自相关特征。同时,不同年份莫兰指数的绝对大小呈波动变化态势,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

表4 中国共同富裕的莫兰指数

矩阵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邻近权重矩阵	0.231 **	0.219 **	0.185 *	0.240 **	0.292 ***	0.347 ***	0.351 ***
反距离权重矩阵	0.127 ***	0.114 ***	0.129 ***	0.129 ***	0.130 ***	0.091 ***	0.101 ***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进一步地,为更加直观地考察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图5展示了代表性年份共同富裕指数的莫兰散点图^①。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落在第一、三象限,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向集聚特征;仅少数省份落在第二、四象限,表现出空间负向离群特征。浙江、江苏、福建等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位居前列的省份始终位于第一象限,对周边省份共同富裕的发展产生示范和溢出效应。甘肃、青海、贵州等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相对偏低的省份始终落在第三象限,说明这些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均相对较低。为此,必须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共同富裕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提供高质量、可借鉴的样板,实现全国各省份共同富裕齐头并进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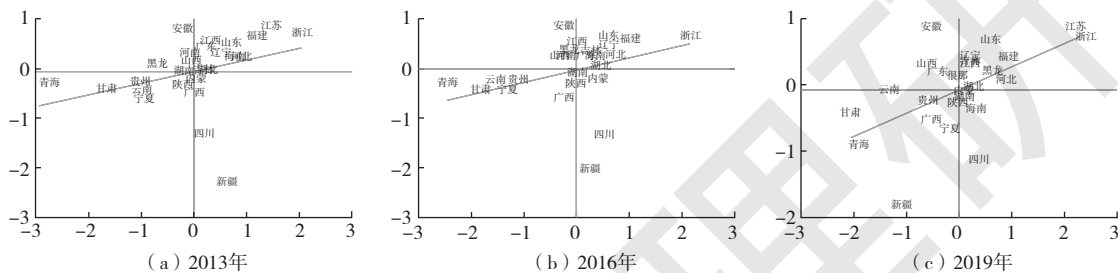


图5 部分年份共同富裕莫兰指数

(四) 区域差异分析

图6展示了中国共同富裕总体差异的测度结果。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总体基尼系数为0.0378~0.0673,均值为0.0522。从变化趋势来看,除2019年总体基尼系数略有上升外,其余年份的总体基尼系数均表现出下降趋势,说明新时代以来中国共同富裕发展虽然存在着区域不均衡现象,但不均衡程度整体有所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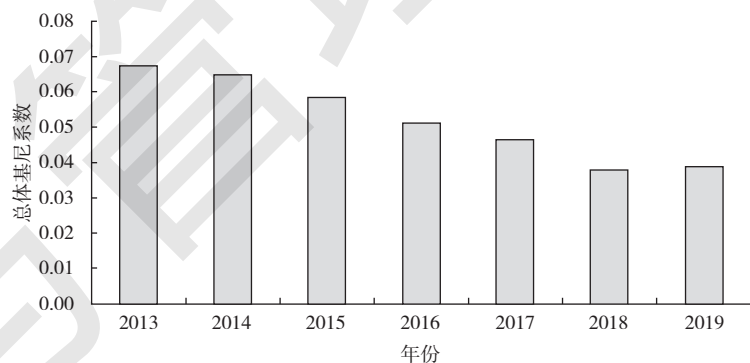


图6 总体差异变动趋势

图7展示了中国共同富裕区域内差异的测度结果。从东中西区域划分来看,区域内基尼系数呈现出“西部>东部>中部”的空间分布格局,说明西部地区内部省份共同富裕的差异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276~0.0340,均值为0.0308,样本期内变化较为稳定;中部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064~0.0252,均值为0.0149,总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特征;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301~0.0769,均值为0.0520,除2019年略有上升外,其余年份逐年降低,与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化特征相似。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在考察期内共同富裕的差异程度较为接近。其中,南方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396~0.0584,均值为0.0496;北方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323~0.0711,均值为0.0511。同时,在2016年之前,北方地区共同富裕的差异程度略高于南方地区;在2016—2019年,南方地区共同富裕的差异程度则超过了北方地区。此外,从变动趋势来看,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均表现出波动中下降的演进特征。

^① 此处的莫兰散点图采用邻近权重矩阵绘制,反距离权重矩阵绘制的莫兰散点图因篇幅所限未予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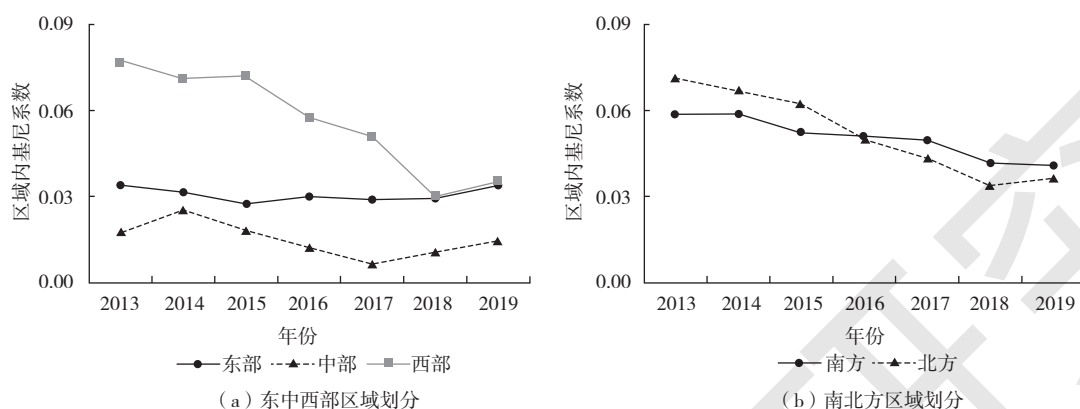


图7 区域内差异变动趋势

图8展示了中国共同富裕区域间差异的测度结果。从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来看,考察期内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354~0.0622,均值为0.0453;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606~0.1068,均值为0.0827;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300~0.0618,均值为0.0490。由此可见,区域间差异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主,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差异相对较低。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逐年降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基尼系数则表现出波动中下降的变化特征。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基尼系数为0.0396~0.0584,均值为0.0496,且以年均6.62%的速度逐年下降,说明南北方区域间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异整体不断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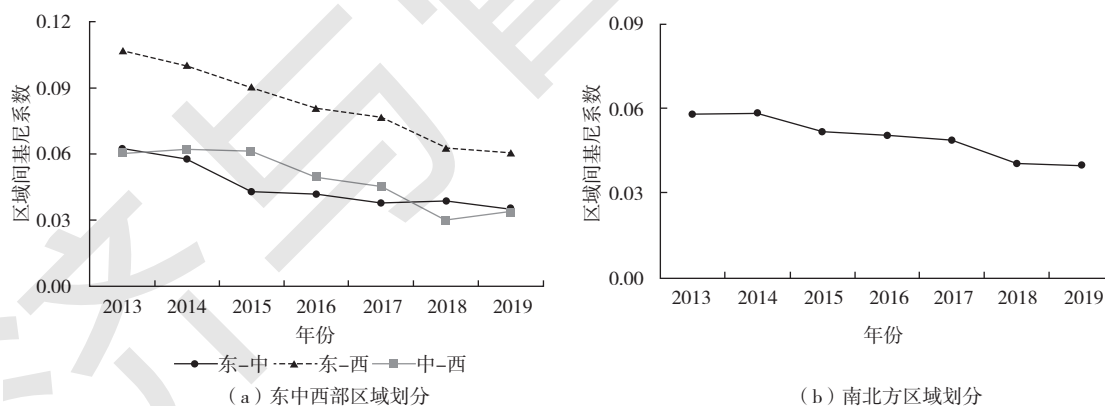


图8 区域间差异变动趋势

图9展示了中国共同富裕区域差异各组成部分的贡献度。从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来看,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贡献度为68.06%~74.30%,均值高达71.05%;其次是区域内差异,贡献度为21.66%~24.94%,均值为23.46%;超变密度贡献度最低,为3.85%~7.00%,均值为5.49%。从变化趋势来看,各区域贡献度在考察期内较为稳定,未发生大幅波动情况。因此,降低共同富裕的区域间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中之重。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贡献度为47.84%~48.50%,均值达到48.26%;区域间差异与超变密度贡献度较为接近,前者为21.65%~28.36%,均值为24.06%,后者为23.80%~29.85%,均值为27.68%。从变化趋势来看,与东中西部区域划分的结果类似,各区域贡献度在考察期内同样较为稳定。因此,若从南北方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未来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应

是着力缩小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内部省份共同富裕的发展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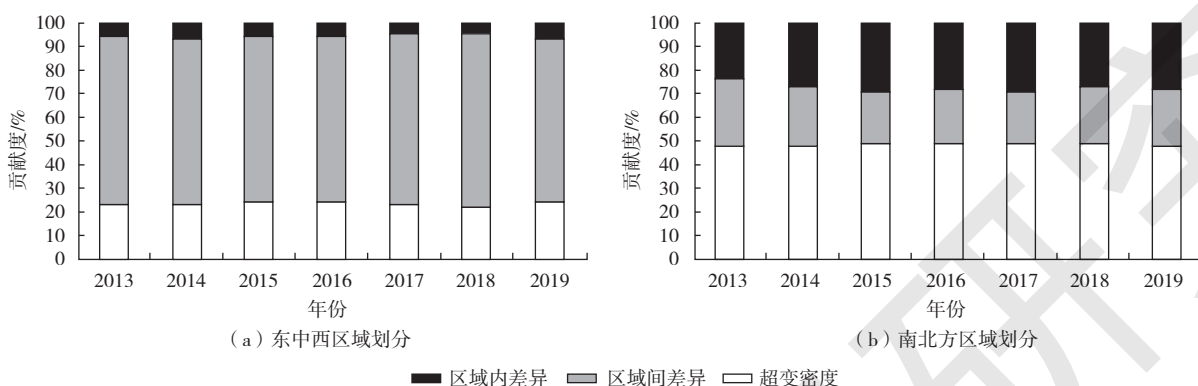


图9 总体差异的来源及其贡献度

六、收敛性分析

(一) σ 收敛检验与结果分析

表5 报告了中国共同富裕的 σ 收敛检验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共同富裕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 σ 收敛系数除 2019 年略有反弹外,其余年份均表现出稳步的下降趋势。从东中西区域划分来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 σ 收敛系数虽然在考察期内总体有所降低,但并未表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因而不存在 σ 收敛特征。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内部各省份共同富裕发展相对均衡,且共同富裕指数的增速差距也相对较小,从而未表现出明显的 σ 收敛性质;西部地区的 σ 收敛系数变化特征与全国较为相似,可认为存在 σ 收敛。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 σ 收敛系数均表现出逐年递减的特征(北方地区 σ 收敛系数 2019 年略有上升),因而存在 σ 收敛。综合而言,除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外,全国及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普遍存在 σ 收敛特征,说明中国共同富裕的非均衡性正在不断改善,这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5 σ 收敛检验结果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南方	北方
2013	0.141 7	0.064 9	0.035 8	0.164 3	0.109 5	0.161 8
2014	0.129 3	0.059 8	0.048 4	0.142 7	0.108 7	0.143 3
2015	0.121 5	0.053 9	0.035 1	0.141 7	0.097 5	0.140 1
2016	0.101 8	0.059 4	0.023 1	0.110 6	0.096 9	0.104 4
2017	0.092 6	0.058 2	0.012 2	0.095 4	0.092 0	0.092 1
2018	0.072 4	0.059 4	0.020 5	0.061 0	0.076 4	0.066 3
2019	0.074 0	0.065 7	0.028 5	0.066 3	0.075 3	0.070 9

(二) β 收敛检验与结果分析

1. 绝对 β 收敛分析

表6 报告了中国共同富裕的绝对 β 收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第一,所有模型 β 收敛系数均为负值,且至少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即全国及各个地区均存在 β 收敛特征,说明在不考虑一系列其他社会经济因

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时,长期来看各省份共同富裕将会逐渐趋于各自的稳态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均衡。第二,全国及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收敛速度存在差异。全国共同富裕收敛速度为 5.71%,半程收敛周期为 12.14 年。从东中西区域划分来看,收敛速度由快到慢依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速度分别为 21.62%、13.63% 和 4.68%,半程收敛周期分别为 3.21 年、5.09 年和 14.81 年。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南北方地区收敛速度大体相当,且与全国收敛速度较为接近。具体来说,南方地区收敛速度为 6.05%,半程收敛周期为 11.45 年;北方地区收敛速度为 5.62%,半程收敛周期为 12.33 年。

表 6 绝对 β 收敛检验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南方	北方
β	-0.290 0*** (0.056 8)	-0.558 5*** (0.138 3)	-0.726 8** (0.276 6)	-0.244 8** (0.077 3)	-0.304 6** (0.105 3)	-0.286 4*** (0.066 2)
省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收敛速度	0.057 1	0.136 3	0.216 2	0.046 8	0.060 5	0.056 2
半程收敛周期	12.14	5.09	3.21	14.81	11.45	12.33
样本量	156	48	48	60	78	78
R^2	0.217 8	0.461 4	0.397 6	0.266 4	0.306 2	0.190 0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2. 条件 β 收敛分析

在进一步考虑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外商投资、对外开放、金融发展及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后,本文检验了中国共同富裕的条件 β 收敛特征,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第一,所有模型 β 收敛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全国及各个地区均存在条件 β 收敛特征。其经济学含义在于,在考虑产业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后,从长期来看各省份共同富裕收敛于各自稳态水平的特征仍然存在。第二,全国及各地区共同富裕的条件 β 收敛速度相对快慢与绝对 β 收敛保持一致。同时,与绝对 β 收敛相比,条件 β 收敛速度更快。具体而言,全国共同富裕收敛速度提高到 6.04%,半程收敛周期相应缩减至 11.47 年。从东中西区域划分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收敛速度分别为 15.44%、32.21% 和 6.28%,半程收敛周期分别为 4.49 年、2.15 年和 11.05 年。从南北区域划分来看,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共同富裕收敛速度分别为 8.96% 和 6.38%,半程收敛周期分别为 7.73 年和 10.87 年。

表 7 条件 β 收敛检验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南方	北方
β	-0.304 1*** (0.061 1)	-0.604 0** (0.213 9)	-0.855 2** (0.246 6)	-0.313 7*** (0.047 6)	-0.416 0** (0.145 9)	-0.317 9*** (0.084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收敛速度	0.060 4	0.154 4	0.322 1	0.062 8	0.089 6	0.063 8
半程收敛周期	11.47	4.49	2.15	11.05	7.73	10.87
样本量	156	48	48	60	78	78
R^2	0.251 6	0.529 0	0.513 6	0.424 8	0.402 1	0.287 4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对共同富裕的准确解读和客观评价成为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本文在深刻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从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了中国2013—2019年26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指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东中西和南北两种区域划分框架,考察了中国共同富裕的时空演进、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特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稳步上升。其中,富裕指数和共同指数均得到了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3%和1.98%。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共同富裕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但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对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存在“追赶效应”。从省域层面来看,浙江、江苏等省份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甘肃、青海等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偏低。

第二,从时空演进特征来看,中国共同富裕核密度曲线表现出明显的右移趋势,主峰高度提高且宽度收窄,波峰数量由双峰变为单峰,说明中国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共同富裕区域发展不均衡程度不断缩小。同时,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分析结果显示,共同富裕发生等级跃迁的概率较大。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中国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集聚特征。

第三,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共同富裕总体差异有所降低。从区域内差异来看,区域内基尼系数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空间分布格局,南北方地区区域内差异较为接近。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共同富裕的差距高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基尼系数逐年下降,共同富裕差异不断缩小。从区域差异的结构来看,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东中西和南北区域划分情形下共同富裕差异的主要来源。

第四,从收敛性来看,除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外,全国及其他地区具有 σ 收敛特征,全国及各地区均存在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特征。同时,收敛速度由快到慢依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南北方地区收敛速度大体相当,且与全国收敛速度较为接近。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强化共同富裕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加快制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行动纲领和战略布局。一方面,充分发挥评价指标体系的引领作用,以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引入相关考核性指标,完善官员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调动各地方政府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性,推动形成“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区域竞争新局面。另一方面,以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政策实践为依托,及时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省域范例,有序推进其他省份和地区共同富裕的试点、试验和示范,加快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途径。

其次,重视共同富裕的侧重性,加快补齐短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虽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共同水平维度提升速度较慢。为此,要在今后的发展中有所侧重,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共享之间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加注重公平问题,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实施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措施,努力改善当前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较大的现状。对于各地方政府而言,应结合自身共同富裕发展的现状,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动本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对于共同型省份而言,在发展中应更多关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对于富裕型省份而言,在发展中应更多考虑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对于同步型省份而言,在发展中应统筹推进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的融合发展和协同提升。

最后,重视共同富裕的区域非均衡性,推动形成共同富裕空间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同富裕的总体差距有所减小,且全国和各地区共同富裕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但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仍要密切关注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问题,不断缩小省份间、区域间共同富裕的发展差距。具体而言,在东中西区域划分视角来看,应采取适当措施努力提升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的共同富裕

水平,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内部以及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在南北区域划分视角来看,由于南北地区之间共同富裕发展差距相对较小,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更加注重缩小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内部省份共同富裕发展的差距。此外,充分利用共同富裕的空间集聚特征,努力打破省份间、区域间的各类边界障碍,加强交流合作,改善共同富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省级层面,无法对更加微观的地级市和县域层面的共同富裕评价提供经验证据;另一方面,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共同富裕的评价测度和特征分析,缺少对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等重要研究议题具体深入的分析,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ALI I, SON H H.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7, 24(1): 11-31.
- [2] SILBER J, SON H. On the link between the Bonferoni index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clusive growth[J]. *Economics Bulletin*, 2010, 30(1): 421-428.
- [3] MCKINLEY T. Inclusive growth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an inclusive growth index for diagnosis of country progress[Z]. AD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4, 2010.
- [4] NARAYAN A, SAAVEDRA-CHANDUVI J, TIWARI S. Shared prosperity: links to growth, inequality and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Z].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649, 2013.
- [5] LAKNER C, NEGRE M, PRYDZ E B, et al. Twinning the goals: how can promoting shared prosperity help to reduce global poverty? [Z].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06, 2014.
- [6] FERREIRA F H G, GALASSO E, NEGRE M. Shared prosperity: concepts, data, and some policy examples [Z].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451, 2018.
- [7] KAKWANI N, WANG X B, XUE N, et al.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2, 30(1): 28-57.
- [8]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8): 117-129.
- [9] 杨宜勇, 王明姬. 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标准及实现路径[J]. *人民论坛*, 2021(23): 72-74.
- [10] 蒋永穆, 豆小磊.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理论逻辑与初步设计[J]. *东南学术*, 2022(1): 36-44, 246.
- [11] 胡鞍钢, 周绍杰. 2035 中国: 迈向共同富裕[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1-22.
- [12] 万海远, 陈基平.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 *财贸经济*, 2021(12): 18-33.
- [13] 李金昌, 余卫. 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 *统计研究*, 2022(2): 3-17.
- [14] 孙学涛, 于婷, 于法稳. 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中国 281 个城市的分析[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2(2): 71-87.
- [15] 向云, 陆倩, 李芷萱.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 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 *证券市场导报*, 2022(5): 2-13.
- [16] 韩亮亮, 彭伊, 孟庆娜.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OL]. *软科学*, 2022[2022-08-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20218.1626.004.html>.
- [17] 胡联, 王娜, 汪三贵. 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评估及面临挑战[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4): 3-14.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斯大林选集: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4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8]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29]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3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31] 杨静, 宋笑敏. 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N]. 光明日报, 2021-09-01(6).
- [3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EB/OL]. (2021-08-17) [2022-10-20].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 [33]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 2021(11): 4-13.
- [34] 叶璐, 王济民. 我国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定[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2): 123-134.
- [35] 吕承超, 索琪, 杨欢. “南北”还是“东西”地区经济差距大?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9): 80-97.
- [36] 许宪春, 郑正喜, 张钟文. 中国平衡发展状况及对策研究——基于“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5): 15-28.
- [37] 刘志彪, 凌永辉. 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 管理世界, 2020(7): 15-29.
- [38] 王阳, 谭永生, 李璐. 收入分配评价指标体系重构研究——基于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视角[J]. 经济纵横, 2019(3): 80-92.
- [39] 聂长飞, 简新华.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的分析比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2): 26-47.
- [40] 张友国, 窦若愚, 白羽洁. 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水平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8): 83-102.
- [41] 田卫民. 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J]. 经济科学, 2012(2): 48-59.
- [42] 杨耀武, 张平.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J]. 经济研究, 2021(1): 26-42.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FENG Yuan¹, NIE Changfei²

(1.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2.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Abstract: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26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9, using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rading method. Then, it analyzes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regional divi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rises steadily, presenting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while low in the west” and “high in the south while low in the north”. The probability of grading transi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relatively high, showing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provinces decrease, and the inter-and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primary sources of common prosperity differences in the east-central-west region and the south-north region, respectively. Except for the east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overall and other regions have significant σ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in the overall and different regions. This paper may expand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s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 convergence

责任编辑: 周 斌; 蒋 琰